展示好跨湖桥文化中的“弄潮儿”精神

——专访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蒋乐平

人物名片

蒋乐平: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、跨湖桥遗址第二、三次考古发掘领队。

■本版撰稿 记者 童宇倩 王肖君
实习生 陈李仪 通讯员 楼卫
本版图片 由跨湖桥遗址博物馆提供

跨湖桥遗址是湘湖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,是国家级文保单位,对湘湖的保护和发展意义深远。本次专访的嘉宾是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蒋乐平,他是跨湖桥遗址第二、三次发掘的考古领队。

就唱响“西湖记”话题,蒋乐平提出:“跨湖桥遗址一度是‘前不着村后不着店’的孤独的文化存在,也是湘湖最独特的存在。跨湖桥人是最早征服河口湿地的勇敢开拓者,是弄潮儿精神的源头,值得更通俗化地解读与宣传。”

跨湖桥博物馆内的独木舟

陶釜

跨湖桥遗址是距今8000年的新石器时代遗址。经过1990年、2001年和2002年三次考古发掘,发现了迄今年代最早的漆器、独木舟及相关遗迹。跨湖桥遗址可以说是“前不着村,后不着店”。在它上面没有叠压比它年代晚的文化层,下面也没有比它年代早的文化层,文化面貌陌生而孤独。

记者:2000年,您还是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副研究员,承担了浦阳江流域史前遗址考古调查的研究课题,调查路线从诸暨、浦江开始,最后到萧山。你对跨湖桥遗址发掘和保护,有印象深刻的事吗?

蒋乐平:跨湖桥遗址的发现过程十分曲折,也很可惜,它本可以比河姆渡遗址更早被关注、重视,因为它在20世纪60年代就被发现,发现时间比河姆渡遗址要早。

1990年第一次考古发掘结束后,考古队选送了四个木质标本到中国海洋研究所进行^{14}C年代检测。结果显示,跨湖桥遗址年代距今达8000年,比河姆渡遗址早了整整1000年。但当时对^{14}C年代测定数据不是十分信任,其他还有时代的原因,考古与遗址保护工作没有跟进。等十年后我有幸看到遗址时,这里已遭受了更严重的破坏。

当初为什么不信任^{14}C年代测定数据呢?主要是因为缺乏地层学、类型学证据的支持。跨湖桥遗址的内涵十分单纯,没有复杂的文化层叠压关系,无法从地层学上确定遗址的相对年代。我现在经常把跨湖桥遗址叫作“前不着村,后不着店”——在它上面没有直接叠压比它年代晚的文化层,下面也没有比它年代早的文化层,所以它是一个“孤独”的存在。

跨湖桥遗址的年代后来能够得到承认,除了其独特的内涵逐渐丰富之外,跟浦阳江流域的考古成果有直接的关系。确切地说,是跟诸暨楼家桥遗址有关。

当时,我们在跨湖桥遗址南边20余公里处发现了楼家桥遗址,年代距今6500年,文化特征属于河姆渡文化,与马家浜文化也有诸多相似,但跟跨湖桥遗址不一样。两遗址均属浦阳江下游,距离很近,这就构成了文化的区域性“叠压”关系,跨湖桥与河姆渡必然存在早晚关系,互不包容。从陶器上看,各个时代陶器的颜色、纹饰、器型等都是不同的,比如跨湖桥遗址没有鼎,而楼家桥遗址有鼎,说明跨湖桥遗址的年代肯定比楼家桥遗址要早。总之,跨湖桥遗址的文化面貌是完全新颖独特的。

陶釜是跨湖桥遗址中最重要的炊具,也是遗址考古发掘里发现数量最多的陶器,其形态跟河姆渡遗址和马家浜遗址的都不一样。另外,陶甑、陶钵、陶豆等也十分独特。

记者:考古发掘多年后,您重新审视过跨湖桥文化遗址的存在价值吗?

蒋乐平:陶器是我们考古人最关注的东西,因为陶器是每个遗址都有的文物,具有普遍的比较性。有机质文物如独木舟,即使当时也存在,也容易腐朽,很难保存下来,相反,陶器、石器普遍存在,是最好保存的。

在跨湖桥遗址的陶器中,我们最先关注的是陶釜,或者叫作绳纹陶釜,它是跨湖桥文化最重要的炊具,也是遗址考古发掘里发现数量最多的陶器。陶釜的形态跟河姆渡遗址和马家浜遗址发现的陶釜不一样。

在原先的认识中,浙江一南一北两个文化体系,钱塘江以北的陶釜没有或者很少有绳纹;而钱塘江以南的河姆渡遗址文化,绳纹陶釜是最重要的炊器。20世纪90年代,大家对跨湖桥遗址的年代有争议,甚至将它划归到河姆渡文化,就是因为跨湖桥遗址的陶釜也多有绳纹。但跨湖桥的绳纹陶釜跟河姆渡的绳纹陶釜又是不一样的,我们现在把跨湖桥陶釜叫作绳纹卵腹釜,它的下部形态就像个鸡蛋,器高腹深,绳纹交叉且拍印得很好,这是跨湖桥文化陶器非常重要的特点之一。

除了陶釜,还有盆、罐、钵、盘、豆等。这些器名看起来千篇一律,但在各种文化遗址中的形态特征千变万化。比如跨湖桥遗址圈足盘和豆的部分器物制作精良,有盘内彩,鉴于盘内彩在盛放食物时容易被磨损,推测不是日常用品,而是盛放供品的祭器。还有数量很多的陶钵,某种意义上就是碗、杯的用途,但它们是圆底,便于捧在手里喝水或吃饭。双耳罐、圈足盘、盆、钵、豆等都是跨湖桥遗址最典型的日常生活器皿。

跨湖桥遗址的独特性,还体现在有机质文物的保存上。出土了这么多的骨器、木器,甚至有编织物。这些都得益于跨湖桥遗址先天的保存条件,可以说,90%以上的遗址都没有如此好的保存条件。跨湖桥遗址保存在地下水位以下,土壤呈弱酸性,腐蚀性不强,便于保存;发掘时,因为边上是一个深度超过20米的砖瓦厂取土坑,这个面积达数万平方米的大坑,已经将遗址土层中的水分沥干了,所以发掘起来很省心,挖表土就像切豆腐一样。

跨湖桥人吃的素食类有稻米、橡子、菱角、芡实、毛桃、杏子等,肉食类涵盖“海陆空”动物;跨湖桥文化已有狩猎、采集、纺织、捕鱼、制陶等社会分工。

记者:今年6月12日,您作为主讲嘉宾在中央电视台新址录制《考古公开课》,讲述8000年前跨湖桥遗址的故事。那么,8000年前的“打工人”吃什么?干些什么呢?

蒋乐平:8000年前跨湖桥人吃什么?这个可以通过考古遗物来分析。首先,跨湖桥人吃米饭,当时有稻作文化了。人类种植水稻的历史有10000多年,养活了世界上一半的人口。关于跨湖桥遗址的稻作,我们单位的郑云飞博士发现了1000多粒稻的籽实,还专门写了研究论文。

跨湖桥人还吃橡子,这属于采集经济。跨湖桥遗址的橡子坑制作相当考究,先挖出筒状或袋状的坑,坑口部用木料搭建成框架结构。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储藏坑,也是消除橡子中的鞣酸涩味的一道水中浸泡工序。

跨湖桥人的“零食”有菱角、芡实、核桃,水果有毛桃、杏子、野生梅、南酸枣。

跨湖桥人吃的肉类就更丰富了。我们在跨湖桥发现了6000多个动物的骨头,大多是碎骨。地上跑的有野猪、麋鹿、水牛、狗、老虎、豹猫、梅花鹿等,天上飞的有天鹅、野鸭、丹顶鹤、大雁、鹰,水里的有鳄鱼、海豚、青蟹、螺蛳、蛏子、乌龟、牡蛎、鲤鱼等。最有趣的是,螺蛳屁股有穿孔,方便吸吮。

当时最主要的烹饪方法是烧烤、煮和蒸。吃肉采用的烧烤,因为我们发现这些骨头都是用火烤过的。他们也煮肉吃,所以在陶釜底部残余物中发现了脂肪类的物质。骨头被敲成一块块的,可能是吸骨髓用。稻米可能是煮的,或者也制成米糕蒸着吃。

8000年前跨湖桥人有哪些工作要做?换句话说“打工人”有哪些?猎人肯定有了,因为弓箭是跨湖桥遗址非常重要的文物。弓能保存得这么好是很难得的。这把残弓,我们一开始还真的不认识,看起来无非就是一根长木条,之前考古从来没有见过类似的器物。日本专家认为这可能是弓,有了这个概念后,我对它的观察就更仔细了,后来还确定是一把漆弓。跨湖桥发现的弓,抓手的位置由于经常性的摩擦,并没有漆。而且它是经过特殊加工的,中间部分的形态便于用手抓握,特征很明确。

跨湖桥的漆弓比日本发现的弓年代要早且精致。为什么要上漆?我怀疑这把弓具有一定的仪式功能,不单纯是狩猎实用器。但不管怎么说,当时打猎已经成为一个“职业”了,其他还有像采集、制陶、纺织、捕鱼等。

漆弓

跨湖桥人是最早的“弄潮儿”,是第一批占领河口地带的征服者与开拓者。驾驶独木舟的跨湖桥人是征服海洋的先驱。跨湖桥文化还发现有祭祀遗迹和神秘刻符,可能在尝试与天地神灵沟通。

记者:您能分析一下8000年前跨湖桥人的生活状态吗?他们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,对我们现代有什么启示?

蒋乐平:跨湖桥文化堪称是弄潮儿精神的源头。跨湖桥人驾驭最早的独木舟,生活在钱塘江口杭州湾,从这一点来说,说他们是最早的弄潮儿,并非虚指。另一个角度,跨湖桥文化承续上山文化,上山人选择的居住区是河流上游,跨湖桥人将生活区域从上游向下游河口地带拓展,实际上是选择了一个资源更丰腴,但同时又很容易遭受水患的环境,其中体现了先民的一种开拓进取的精神。因此,我把跨湖桥人定义为第一批占领河口平原的勇敢征服者。

跨湖桥独木舟,研究表明它可以在近海航行,构架成边架艇,甚至可以进入海洋。跨湖桥独木舟是海洋文化的最早证据,尤其对于后来南太平洋岛屿的开发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。南太平洋地区岛跟岛之间的交通工具主要就是独木舟,最早的独木舟实证就在跨湖桥。所以我觉得,跨湖桥文化对人类文明拓展的意义非常大。

为什么说跨湖桥人是勇敢者?这跟他们最后的命运有关系。之前说到,河口地带,特别是钱塘江口,容易遭受水灾。跟水抗争,可能是跨湖桥文化的重要主题。最后,随着海平面上升,湘湖谷地的环境恶化,实际上跨湖桥遗址是被海潮吞没了,跨湖桥人只能向别的地方迁徙,跨湖桥文化末期开始的海平面上涨事件约持续了数百年,约距今7000年前,海潮有所退却,宁绍平原的古环境得以改善,河姆渡人开始占领了杭嘉湖平原,之后的文化再也没有中断了。

从这段历史来看,跨湖桥文化代表的勇敢开拓精神,基本跟我们现代萧山崇尚的时代精神一脉相承,完全可以看作是一个8000年前的精神源头。

记者:8000年前的跨湖桥人有怎样的精神世界呢?

蒋乐平:8000年前已经存在“天人沟通”的现象。在跨湖桥遗址中,我们发现了一处举行仪式活动“祭坛”遗迹——它是一个分层的土台形遗迹,一层一层向上堆高,共19小层,每层面都有一个浅坑结构的“火烧面”,代表着一次仪式性的活动。“火烧面”旁边的坑洞中还出土了一些人骨头片和鹿角,很可能是作为祭品。

那么祭祀的对象是什么?跨湖桥遗址有太阳纹,万物生长靠太阳,它跟农耕民族的关系是很密切的。我是这样推测的,水患应该是跨湖桥人最为关注的难题,而火与水相克,跨湖桥文化彩陶不但有太阳纹,还有火焰纹,所以这些祭祀活动围绕的主题应该是对水的抗争,人们通过举行这些祭祀活动,达到对土地的拥有、占领目的。遗址出土的彩陶上还有类似“天梯”的图符,木器上有形似“二八”字形符号,鹿角器也有类似符号,研究者认为这些都是原始的卦符。尝试与天地神灵的沟通,这些都是跨湖桥人精神活动的写照。

跨湖桥遗址、井头山遗址都是距今8000年,或可作为浙江境内同类型遗址一起打包申遗。

记者:6月底,湘湖主动牵手西湖,提出“唱响西湖记 缔结姊妹湖”口号。您觉得跨湖桥文化遗址能如何助力“新”湘湖圆梦?

蒋乐平:申请世界文化遗产从本质上来说是为了更好地保护。由此看,学习西湖对文化遗产的重视与保护,持续做好对跨湖桥遗址的保护工作是重要内容之一。同时,我们需要再深入研究跨湖桥文化,把她的独特价值发掘总结出来。同时也需要对跨湖桥文化做好通俗化的传播,让更多的人对湘湖地区的远古历史有深刻的了解。

最近,余姚井头山遗址有大发现,它的类型跟跨湖桥文化遗址类似,年代也是距今8000年左右。像这类距今8000年左右的遗址都具有特殊意义。随着农业的起源,东亚大陆人类在10000年前从山地洞穴走向河谷盆地,又在8000年前从河谷盆地向河口湿地进发,开始面向海洋、拥抱海洋,都属于重要的历史发展节点。我觉得距今8000年前相近时间轴承点上的遗址,比如跨湖桥遗址、井头山遗址等,或许可以作为浙江境内同类型遗址一起打包申遗。

太阳纹彩陶片